

媒介批评的大众视角及新闻报道角度的影响

陈 晨

(西藏民族大学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和公众对媒介产品及传播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社会评价活动,对媒介本身有着极高的市场过滤作用,也使得受众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变迁中树立强化对媒介的反思。本文以“电影《逐梦演艺圈》和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学者视角和公众视角下的媒介批评”和“唐山打人事件”报道所遭遇的媒介批评为例,阐释主流媒介对于事实报道的角度选择与媒介批评中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继而指出中国媒介批评正在从“学者视角”逐步转化为“公众视角”。

关键词: 媒介批评 报道角度 学者视角 公众视角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218/j.issn.2095-4743.2022.38.044

引言

媒介是新近发生事实的重要接收途径,对于因为“接收途径”的差异所产生对事实的扭曲或事实本身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并非媒介能够承受时,作为媒介监督的媒介批评则产生,是除了政府监督外重要的“市场监管”。我国媒介批评历史并不长,出现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日,随着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入融合,媒介批评也从“学者视角”的官方批评不断转移到“公众视角”的大众批评。

一、“学者视角”与“大众视角”的媒介批评

所谓“学者视角”是指,专业媒体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或学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媒介传播行为的批评活动。这一部分媒介批评更多的是处于媒介传播与发展的专业角度,以及传播行为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的出发点。他们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能够很清晰地指出媒介传播中所出现的理论性弊端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但缺点也是明确的,因为较高的媒介专业批评素养和更具有前瞻性的批评角度,造成的结果是很难通过普通民众的角度,以大部分的“市场化”水平分析当下传播状态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影响而所做出的判断。

例如,专业院校毕业的电影导演毕志飞拍摄的励志电影《逐梦演艺圈》上映前,宣传力度大,甚至邀请国内知名导演为此电影召开座谈会,邀请众多记者为其站台,拉满市场的期待。上映后大众对于电影的口碑急转直下,甚至有公众视角下的媒介批评为“这是媒介传播中立地位在向金融市场低头”。在大众为此部电影贴上负面标签后,拥有资深“学者视角”的主流媒体传播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位中国新生代导演的优秀作品,应该被更多有理想的年

轻人所接受”。更有甚者表示“在西方价值观影响下的中国青年人已产生一种指鹿为马的错误审观”“不是电影变了,而是大众变了!”等这种“要求强行接受”的态度并没有拯救这部影片,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中,媒介批评出现了不同的方向与渠道,“学者视角”对于电影的批评角度放在了“大众审美”上,认为民众没有接受这部电影是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导向以及民众的“审美”出现了变化。在自媒体中,我们能感受到民众对于电影的批评要少于对媒介宣传的批评,原因则是因为电影是艺术作品,对个人的偏好有随机性,但媒介对于电影的评价传播是有社会全面性,所以在这场媒介批评的博弈中,逐步从电影的批评转为了主流媒介与普通民众或自媒体之间的批评。

与“学者视角”相对应的则是“大众视角”“大众视角”无论从出发点,批评方向和深入程度以及受到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偏见都与“学者视角”有着较大的不同,呈现出“短平快”的批评感受,没有更多经得起推敲和更深远顾虑的影响,看起来并不专业,理论上会更容易被误导,生命力并不旺盛。但随着近年来社会新闻出现“学者视角”的新闻观点出现明显的纰漏与错误,例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对于“肇事者”的认定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进行的推断等,使得以往拥有专业“学者视角”的新闻媒介在当下社会有了“污点”。相比之前一直被诟病前瞻性欠缺和个人化倾向的“大众视角”随着自媒体的不断进步以及专业新闻传播出身的从业者增多,使得“大众视角”的新闻传播媒介有了更专业的引导力,加上视角倾向平民化,这一类媒介产生的新闻媒介批评更具有生命力。

二、主流媒体媒介批评中“学者视角”的社会责任

1. “学者视角”在媒介批评的位置

媒介批评包含五个层面：其一是文本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展开；其二是行为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活动中的传播伦理展开；其三是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展开；其四是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体制问题展开；其五是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针对媒介文化问题展开。由此，可以比较具体地揭示媒介批评的内涵，是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1]。

而主流媒体在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是传播最为广泛，也是因为主流媒体拥有大量具有资深媒介素养的“学者视角”，运用媒介批评的五个层面，理论上可以针对媒介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专业批评，所以在社会层面中也最具有权威性。

2. “大众视角”在媒介批评的崛起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我们媒介传播主要为电视、报纸与收音机，都是单方面信息传播的载体，大众更习惯于接受信息，接受以主流媒体提供的“学者视角”来分析判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二十一世纪移动终端网络的迅速发展，大众不再拘泥于“接受媒介批评”，而是倾向于更多地表达，“大众视角”的媒介批评随即而生。

市场的改变并没有引起及时引起“学者视角”的媒介批评转型，给了“大众视角”野蛮生长的空间，千禧年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的各种“匿名贴”则足以说明这一点。直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力度加大，才逐步规范。但依然会有不负责任的言论出现。而对于此，笔者认为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大众网络素质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学者视角”在媒介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很好运用媒介批评引导“大众视角”。使得“大众视角”过度使用自我表达。

3. 媒介批评中“学者视角”与“大众视角”的关系

“学者视角”既然作为传统权威的媒介批评模式，在新时代下依然有作为。它不仅是引导媒体传播方向的重要价值方向标，更应探下身子了解“大众视角”下普通民众的需求与视野，因为当下社会不再是“电视、报纸、广播”单方面接收信息的时代，随着“5G”网络和“融媒体”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元宇宙”传播模式，“学者视角”将不断退去“官方”的荣光，而“大众视角”的媒介批评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地位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媒介批评中的“学者视角”消亡

殆尽，而是需通过新兴媒体不断融入“大众视角”，使其原先杂乱和过度的媒介批评加入更专业高级的媒介素养，从而拉近媒介批评中“学者视角”与“大众视角”的关系，最终在“大众视角”中体现出“学者视角”的专业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普通民众对于新闻的看法。

三、“大众视角”的媒介批评在主流媒体中的呈现

1. 媒介批评中的“错”与“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长之先生写过多篇探讨“批评精神”的文章探讨“什么是批评精神？就是正义感”^[2]，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非不能模糊，也不能放过自己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的愿望。在自媒体发展蓬勃的当下，媒介传播在社会监督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及时地为民众传播有关当下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更是为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保障提供了权威保障，但一部分报道在媒介批评中也存在正确与错误之争。

2022年7月，有网友在视频网站上发布了《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视频中二舅因为残疾而导致生活诸多不便，但依靠个人顽强意志和对生活幽默的态度，对发布者产生了正面影响。一经发布在网络上引起论战，一方批评者认为视频中二舅的残疾是因为当时医疗技术欠缺导致，理应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补助与照顾。但实际情况是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另一方则认为这是新时代下对当代年轻人内心世界的正面构架，重点应该放在对社会的正面引导作用。更有甚者认为这段制作精良的作品是作者的炒作行为等。种种迹象表明当下的媒介批评已经倾向于“大众视角”，而专业的“学者视角”明显处于“弱势”，媒介批评将此次视频转变为“二舅”的“补助”与“社会影响”的讨论中。

在这样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在媒介批评下并不应该聚焦于行为的错与对，因为无论是患者自行就医，还是医院渠道收治病人或用现代设备实现“无人机配送”，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要对病人的治疗，目的是正确的。行为方式可能更需要媒体通过报道的角度去阐释选择无人机的原因。遗憾的是这则新闻中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这就使得媒介批评将此体现出来。

2. 媒介批评中“大众视角”映射的问题

从朱思凝发表的《人民网媒介批评的媒体实践现状与反思——基于对人民网《媒介批评》栏目文章的内容分析》一文中所谈到“人民网媒介批评的媒体实践现状”问题中指出“相比记者、教授等专业人士做出的批评，群众实践具有更高活力，人民网媒介批评已经呈现出大众化特征。”究其

原因,一方面,发表在新闻媒体上的批评文章,不像学术期刊上的批评文章那样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只要言之有物即可通过审核;另一方面,当前媒介繁荣,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加之群众民主意识增强,参与度固然提高^[3]。

上海无人机送药的报道的媒介批评中不只是对患者与医疗资源的讨论,也是对媒介传播过程中存在角度问题的一个思考。

在上海无人机送药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提及如果无人机失控会不会造成次生灾害;风控期间的上海有多少病人急需用药,这样的运输方式能否替代传统的就医模式;是否有患者存在用错药的情况;这样的运输成本是否能与传统就医模式持平或降低;运输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等这些媒介批评中“大众视角”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这则新闻会被大众认为是在“摆拍”,用于缓解上海出现疫情而承担的“压力”。

但也正是媒介批评中的“大众视角”为媒介传播过程中提供了方向与价值,督促媒介对于媒介批评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深入报道,解决大众心中的疑惑,促使新闻报道的全面客观和媒介批评的价值导向。尖锐的批评固然能揭露问题,但媒介批评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如果只给意见不给标杆,媒介虽能修正但始终缺少标准。而持正面态度的媒介批评为业界提供了标杆,让人们知道何为好的新闻宣传、何为有效的传播策略,批判与褒奖相辅相成,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媒介生态。

四、主流媒介在媒介批评的“大众与学者视角”下“自我批评”

当下主流媒介在媒介批评中依然显得过于保守,在2022年6月发生了“唐山打人事件”中,媒体一经报道,网络中掀起一阵讨论热潮,在没有查清事件原委的情况下,网络评论在短时间内甚至有对打人者身份的无端猜测等这样没有依据的“出格言论”,以此也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中的“大众视角”目前依然存在非理性特点,但“非理性”也需分为“个人情感输出”与“现实基础未满足”两方面,“出格言论”明显属于后者,这样的媒介批评内容与之后警方的调查研究结论有明显相悖。但在当时实际具有“煽动性”。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才表达媒介对于人类的意义是帮助人们传送信息的站台或货车,包括观众反馈的相互作用传播,是给予指示和方向的路标;是去伪存真的过滤器^[4]。简单粗暴的掩盖媒介批评中的“大众视角”会让“学者视角”中对媒介传

播的作用产生疑问,从而无法达成发布会最核心的目标,变成媒介传播中一段“没有意义”的直播。

得到媒介批评而仓皇修正不如通过媒介批评的“学者视角”首先从内而外进行改变,转变传统媒介思想,接纳“大众视角”,让市场参与其中,形成自主改变,承担应有的媒介批评与纠正的社会责任。

在急速发展的大数据网络时代下,“学者视角”已逐步开始了“大众化”,从不断出现的媒体学者论坛和公众号都能发现原本只是立足当下的“大众视角”开始逐步显得“专业与学术”,无论二者的发展如何,都对主流媒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方向舵”作用。

结语

当下,媒体环境已经从传统媒介时代步入新媒介传播时代,相对于以往有了更快速,更便捷以及更透明地信息传播渠道与模式,这使得以往受众群体有了更多参与新闻传播的途径与意愿,不再是传统媒体中“专业视角”占据把控新闻方向的主导地位,而是让位给了拥有“大众视角”的普通受众,尽管大多没有经过新闻传播学习的普通视角虽然无法从传播理论的专业视角去分析新闻传播,但也体现了新闻传播参与者对于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不能一概而论地扣上“绝对非专业”的帽子。“学者视角”应将视野分出一部分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原因与背景,形成“学者视角”和“大众视角”都能够相适应的中间地带,在双方都能够达到意见满足的前提下,进行更科学和实际讨论。当然,“大众视角”也应在日益变化的新媒体框架下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从而提升“大众视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辅助“学者视角”对新闻事件的影响,总体提升全民的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 [1]董天策.学理三棱镜:媒介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413-414.
- [2]董天策,王雅轩.充分发挥媒介批评的作用[J].青年记者,2021(16):18-20.
- [3]朱思凝.人民网媒介批评的媒体实践现状与反思——基于对人民网《媒介批评》栏目文章的内容分析[J].视听,2021(12):9-11.
- [4]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叶晓辉,廖文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5.